

自序

近兩年間的中國貨幣制度和金融市場，可說是歷史上變化頂劇烈的一個階段。自從一九三四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便有白銀的大量流出，和因之而起的極度金融恐慌。中間經過幾次的政府干涉，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便有幣制的改革。

因為各種刊物不斷的要求，我在這兩年中間寫了許多關於幣制和金融問題的文字——篇幅差不多要占我在那時期中全部作品的半數。對於所有比較重大的問題，我差不多不會遺漏了一個。許多朋友勸我寫一本對於幣制和金融問題的書，到現在不會有工夫寫。把裁剪下來關於幣制和金融問題的文字排列起來一看，到覺得那中間已經在無意中成了一些系統。這一期間的史料，是可以寶貴的；而我在當時所下的觀察和估量，後來的事實差不多也證明完全準確。因此我便把牠們彙集起來，加一個簡單的分類，而成了這一本書。

自然，本書中的每一篇，都是自成起迄的。這對於研讀全書者，有時也許要遇到一些重複；而把他

作參攷用或者隨意翻閱的人們，却反而格外便利。

章乃器一九・三六・四・二七・

目次

第一編 概論

經濟論爭中的兩條戰線·····	一
怎樣研究中國的金融問題·····	三
貨幣金融所反映出來的中國社會·····	三
中國財政金融之現勢·····	四
當前的財政金融問題·····	六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七

第二編 國際爭奪下的中國貨幣金融

最近資本逃亡的兩條去路·····	九
------------------	---

中國的國際收支·····	一〇九
國際投資市場的中國·····	一一七
英美在華的貨幣戰爭·····	一二九
列強在華貨幣戰爭的現勢·····	一三五
由國際貨幣戰爭說到「上海金鎊」·····	一五二
列強對華貨幣戰爭的現勢·····	一六三
羅斯爵士遠東之行·····	一七五

第二編 白銀問題與貨幣制度

當前的白銀問題·····	一八一
銀問題與財政問題·····	一八六
白銀出口增稅以後·····	一九五
金融恐慌與幣制危機·····	二〇四

美國白銀政策與中國.....二四

中國貨幣的前途.....二九

金價高漲——物價暴騰.....三九

幣製改革以後.....三四

幣制改革後金融政策之重估.....四四

第四編 中國金融制度

中國金融統制論.....二六一

經濟統制與銀行.....二六六

我國銀行業底前途.....二七三

當前的金融問題.....二八一

金融恐慌中金融制度的演變.....二八九

中國金融的現勢.....三二五

中國之票據市場·····	三六
上海底金融·····	三九
上海底兩個證券市場·····	三九
上海地產之今昔·····	三四七

第五編 附錄

工商業金融問題研究報告書·····	三五
對於增加籌碼問題之意見·····	三六四

經濟論爭中的兩條戰線

一切理論的研討，到了最高深的一個階段，必然要連繫到哲學；一切理論的鬥爭，到了最高深的一個階段，必然要連繫到政治。更正確點說：我們有了哲學的認識，然後能夠對於某一部門的理論，有很緊張的理論鬥爭。我們爲了政治問題的緊張，不能不對於各部門的理論，有很緊張的理論鬥爭。

中國的學術界，從清末維新和守舊兩派的鬥爭到近年來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開展。在那過程中間，守舊派的政治活動，由張勳的復辟到袁世凱的稱帝，以至溥儀的甘爲傀儡，他們的理論鬥爭，由袁世凱的下令讀經到吳佩孚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以至目下的存文、復古、讀經和關內外交響的所謂王道。他們由過去的把握住整個的反革命集團到目下的僅僅占反革命集團中一方面的勢力，由過去的「苦心孤詣，抱殘守缺」到目下的「廉恥道喪，斯文掃地」，「醜惡的面目，可說是暴露無遺了。凡是還有點是非之心和羞惡之心的人們，都會判定他們是歷史上的叛逆者，都知道他們的理論是奴才哲學，是漢奸哲學，他們和外洋進口的種種色色的古典學派與復古思



潮湊合起來，成爲整個的反革命陣線。這個反革命陣線，在目下垂死的一個階段當中，在帝國主義的保護、合作之下，和新的、進步的革命勢力，作猙獰的最後掙扎。這是目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部門——文化部門；牠是隨着目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尖銳化而尖銳化的。

在經濟學的領域裏面，這種鬥爭也同樣的存在着，而且也同樣的有極大的開展。自然，說到經濟學，守舊派的勢力本來是比較薄的。就是會左一班人的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在當時已經算是開明的守舊派——在死硬的守舊派心目中，已經是「異端」。會左一派和當時由外洋輸入的亞丹·斯密的原富，雖然中間有「吾道行」和「吾道不行」的權利衝突，然而根本上還沒有各不相容的對立。在以後的幾十年間，以原富爲中心的古典學派，慢慢的在現實的各部門伸展他們的勢力，中間還夾雜着多數的離開了哲學觀念，忽略了政治意識，而專以分析一些浮表的事態爲職志的流俗經濟學者。一直到了「五四」的前後，新經濟學才被介紹到中國來。牠馬上在革命理論方面，開展很大的勢力。在這時候，古典學派在保持資本主義的立場，自然而然的發展而爲反革命的勢力。當然，這一階段的理論鬥爭，比較的是空洞；就在一九二六——七年間的大革命當中，這兩派的論爭，還依然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和主張社會主義的對立當中，作單純的理論鬥爭。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以後，帝國主義進一步的嘗試干涉中國的政權。這一階段中帝國主義在遠東的角逐，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爲止，可說是英美勢力的全盛時代。牠們是最進步的帝國主義；牠們對於半殖民地的經略，都有很深刻的技術修養。尤其，英國自從在沙面漢口九江等處吃了虧之後，格外學得乖覺；對於中國，是採取特殊的懷柔政策。牠們注意於製造在華的輿論，尤其注意於御用的經濟學理論的培養。於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古典學派，以及忽略了政治意義，而專門分析浮表事態的流俗經濟學者，就成了牠們最理想的工具了。

另一方面，進步的分子在革命失敗以後，減少了純理論的介紹和革命策略的主張，而致力於現實的批判；就在批判現實的工作當中，牠們在財政、金融、貿易、產業，以至農村經濟各部門，和古典學派以及流俗經濟學者交鋒。如上文所述，這些現實專門問題的批判，本來差不多，可說是古典學派和流俗經濟學者所獨占的。那「萬流景仰」的海關報告，從來就沒人敢用相反的觀點，給牠一個批判；牠們的主要機關報英文商業金融報，一向是被認爲分析現實問題的權威；美國商務參贊安諾德，一向是被高等華人尊崇爲大眾的導師。只是到了這時候，才有許多人用進步的觀點，揭破他們的欺騙性。甘心做工具的人們，無疑的是「善變」的。也可以說：主子教他們改變作風，牠們在事實上不敢

不改。「九一八」事變以後，雖然他們在內部起了親日派和歐美派的爭端，而對於中國民族的前途，他們爲帝國主義在華的投資和貿易打算，可說是一致的。由原來的主張維持現狀，而進一步的主張對敵妥洽。對於上海協定和塘沽協定的推進和擁護，當時的親日派和歐美派可說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內中許多天良未喪，一時誤入歧途的流俗經濟學者，這時却因爲環境的刺激，不能不發生一些政治意識。他們在發生了政治意識之後，便很堅定站到民族的戰線上去，而成爲工具化的古典學派的反對派。自然而然的，他們便和主張民族革命的進步分子聯合一氣，而成爲很廣大的民族戰線。這樣，時代和環境便造成中國經濟學界中帝國主義戰線和民族戰線的尖銳對立。

古典學派的歷史上的價值，是誰都不能否定的。在十八世紀末葉歐洲封建制度崩潰之後，特權的消滅和土地的解放使人類的生產活動增加了廣大的新園地，蒸汽機的發明使人類的生產力得着了偉大的新途徑。在這個廣大的新園地當中，在這條偉大的新途徑上面，人類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活動力，而不至妨礙別人的利益。而且，也只有人類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下大刀闊斧的從事生產活動，然後才能用新的文明來填滿了這廣大的輪廓。個人的發展就是人類文明的發展，個人的利

益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在這個新的天地之下，的確是完全對的。

特別是英國，牠對於自由主義的擁護，真可說是善自爲謀——善於爲自己國家打算。英國是工業的先進國；差不多在整個的十九世紀當中，牠是全世界經濟武裝最堅強的一個國家。當牠用自由貿易號召天下的時候，牠明明白白的知道：牠的工業生產和金融資本的力量，足以對抗任何的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只有牠掠奪別人的可能性，而沒有別人掠奪牠的可能性。這好比是在一個村莊裏面，只有一家武裝的強盜，而其餘的盡是沒有武器的良民；那一家強盜自然是樂得教大家都洞開門戶，以便於他們的自由掠奪。所以，亞丹·斯密的學說，雖然是唱得很好聽的國際分工和世界大同，而結果，這一部門的理論，却剛剛被運用起來，以完成英帝國主義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從十八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整個的資本主義，在百餘年猛烈的開展之後碰了壁，封建制度所騰讓出來的輪廓，已經被填補得擁擠不堪，矛盾百出；這個輪廓又變成人類進化的障礙了。在這時，德美日各國工業迅速的進步，使英國失去牠經濟武裝的絕對優勢；英屬諸殖民地甚至連英本國，都受着外貨傾銷的威嚇。於是，在整個的古典學派的產物——資本主義——動搖之下，英國也只好收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了。近年來英國的關稅壁壘，築得和別人一樣的高；關稅壁壘的範圍，擴大

到所有的殖民地。這好比那村莊裏的強盜，已經由一家變成三四家，而新做强盜的二三家，只有比原來的一家還要兇；那原來的一家強盜，到這時也不敢再主張門戶洞開，反而自己也關起門來了。現時代國際間的一切，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帝國主義自相相率關起大門的時候，對於半殖民地國家，依然是要牠門戶洞開，以便於他們的掠奪。但是牠們又不好意思公然說：「爲了我們掠奪的便利，你得保持門戶的開放。」於是，牠們便從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裏，提出來自由主義的好聽名辭，做一個煙幕；而我們的御用經濟學者，就順從意旨，把這御賜的自由主義運到中國來大吹大擂。這是十分明白的，在目前的時代，運到半殖民地以後的自由主義，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掠奪自由。以資本微弱，技術幼稚的半殖民地民族工業，要和實力雄厚，技術熟練的帝國主義產業去自由競爭，就好比是虛弱的小孩和健壯的成人賽跑，那成敗之數，早就決定了。

整個的古典學派，除了自由主義可以做帝國主義掠奪自由的掩護之外，個人主義又恰好是帝國主義瓦解半殖民地民族戰線的利器。半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用個人主義來做個別的掙扎的工作，剛好是便於讓人家來個別的消滅。無疑的，半殖民地的古典學派，是不折不扣的亡

國經濟理論；這種理論從中國人的口中，筆下發揮出來，便成爲不折不扣的漢奸經濟理論。有幾位外國朋友，在他們自己的國內，是高倡管理經濟和集團行動；而一到中國來，使馬上是滿口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有時他們說到外國的事情，是主張管理經濟和集團行動；而一說到中國的事情，便立刻主張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在這種情形之下，跟着商業金融報高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者，他們的作用所在，就很顯明了。

在自由主義之下，帝國主義戰線在中國，是用國際化的總題目去開展。他們是主張用四億五千萬貧弱的中國人的苦力，做世界恐慌潮流的中流砥柱，去重新建立國際商品需給和資本需給的均衡。簡單的說是想由中國民族單獨的力量，去負担世界恐慌的損失。分析言之，可以列爲四個項目，就是：生產國際化，市場國際化，交通國際化，和貨幣國際化。

生產國際化本來是根據亞丹·斯密的比較成本說，是一個由國際分工走到世界大同的幻想。這個幻想，在帝國主義間是絕對沒有實現過；反而，在帶有備戰意味的自足自給的經濟政策之下，在關稅壁壘高築的環境之中，國際分工是愈走愈遠。可是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間，國際分工却已經做

得相當成熟。這是工業和農業的分工，是帝國主義供給工業品，殖民地供給原料品的分工。在這種分工之下，在物價剪刀形的發展當中，在不等價的交換過程裏面，殖民地變成帝國主義的營養品，而一天一天的貧窮化下去。

生產國際化運動，在中國已經有深遠的歷史。牠在最近表現出來的，便是中日經濟提攜口號下，由中國多生產棉花以供給日本紡織業的計劃。如果我們提出中國不能以棉花供給日本，使牠製成火藥再來屠殺我們的理由來反對這種計劃，那似乎是大意氣用事，而不夠得平心靜氣。因此，我們只好退一步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應該不應該有一個國防？」如果沒有人能用否定的口氣答復這個問題的話，那我們就不能不主張：在國防的意義之下，我們應該認定糧食問題比棉花問題嚴重十倍，我們應該先設法補充這每年短缺到一二萬萬圓之鉅的糧食。我們爲了顧慮到戰時糧食缺乏的危機，要堅決的反對把種糧食的耕地改種棉花，而且還要主張把國內所有種鴉片的耕地，一律改種糧食。

上段所說的是指戰時經濟而言；事實上，就在平時經濟的意義之下，我們也得反對中國農產的國際化。半殖民地國家生產的不應該國際化，除了上文論爲原料供給國的危機以外，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牠本身的力量，不可能維持海外市場。海外市場的開闢和維持，是需要帝國主義海空軍的力量，以及金融上，航運上種種大規模的設備的，爲甚麼我們的絲和茶的海外市場，會被英日侵奪得幾乎淨盡呢？絲茶出口衰落以後，各產地經濟突變中所受的痛苦又是怎樣呢？這種教訓難道還不夠嗎？

我曾經介紹過一篇登載在倫敦經濟學季刊的論文，是一位湯麥司教授所著的世界恐慌中的印度。他在那篇文字裏面，毫不客氣的指出頑固的印度農民，對於民族的貢獻，要遠過於他們的統治者和經濟學家。事實是這樣：印度當局和經濟學者，一向努力勸導農民改種國際市場商品，而農民不從，依然種植以自足自給爲主的糧食。因此，印度在世界恐慌過程中，所受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並不多。反之，如專產咖啡供給國際市場的巴西，專產砂糖供給國際市場的古巴，甚至要把過剩商品拋到海裏去，損失真是可怕！此外，南美許多農業國家近年經濟恐慌的情形，要比任何帝國主義都深刻。這一篇文字，足爲中國主張生產國際化者的當頭棒喝。同時也可以證明：在倫敦出版的典型的古典學派的刊物，牠的筆調，也和在中國的古典學派不同。

市場國際化的主張者，他們反對中國有關稅壁壘，反對管理貿易，而認爲生產落後的中國，應該盡量接受成本低廉的外國商品，以提高人民的幸福。他們更認爲貿易入超可以轉變爲國際投資，可

藉此以建設民族資本。本他們根本否認不等價交換，說以為車夫拉教授，雖然表面上是不等價交換，然而可以得着教授寶貴的教訓，依然是值得，依然要努力的拉。

中國對外貿易的利害，我們有擺在眼前的整個農村的破產，似乎用常識就可以判斷了。固然，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我們是學了一些生產技術。然而，用整個的農村破產去掉換這一些生產技術，是不是得不償失呢？車夫拉斷了氣，而教授所給與他的，還不過是一些皮毛的皮毛呢！我們為甚麼一定要做車夫？是命中注定的嗎？為甚麼我們不能自己保留一個人的身份，去學習一些技術呢？為甚麼別的國家，可以大模大樣的在國民經濟的建設當中，輸入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呢？這真是典型的奴隸哲學了！

貿易入超能不能轉變為外人在華投資，以及外人投資能不能建設中國民族資本，那都還要看入超的內容和投資的性質而定。我在本刊去年冬季號發表了一篇中國國際貿易之檢討，曾經把民二十三年以前五年間的輸入貿易做一個分析。那結果，在十億圓至二十二億圓的輸入品中，勉強可稱為和工業建設有關的——事實上大部分還是在土木建設上消費的——項目，只占二億到三億圓，而入超的金額，却有五億到八億六千萬圓之多。這種貿易入超的內容，顯然大多數是談不到轉變

爲投資。而外人在華投資的性質，近年來差不多全部是直接運用於產業的經營。這是對民族工業的一種壓迫，那裏能談得到建設民族資本呢？且看，日本對華紡織事業投資的增加，已經把華商紗廠幾乎打倒了！這又是不可掩的事實呀！

爲了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貿易由入超變爲出超，也許要使主張市場國際化者增加了一個新的理由：船到橋頭自會直，貿易讓牠自由發展，自然會由逆勢轉爲順勢的。

我們所爭的，倒還不是入超和出超的問題，而是市場由我們自己管理和由別人控制的問題。如果市場是依然在國際化的意義之下由別人控制着，入超固然是有害，出超也絕對不會有益。這三個月間的貿易出超能樂觀嗎？不能，牠是貨幣改革後一時的現象，是不能持久的；牠是變相的資本逃避，是消耗國力的。爲了外幣漲價已多，再買來匯出去不合算，有些人就裝運漲價還不多的商品出洋。這種商品如係國內的必需品，我們將來大半還要用較高的價格買回來。那樣，現金依然要流出，反而還要流出去多一些。如同棉花的出口，恐怕就一定要得這樣的結果。此外，日人庇護下的私運進口貨物數量的猛進，也值得我們注意。這樣，這種出超是值得樂觀的嗎？

自由主義者不承認市場國際化，就可能讓別人控制，他們認爲各個人自由的需要，就等於整個